

中国共产党报刊党性原则的嬗变(1921—1949)

杜 贺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报刊党性原则中,长期存在思想理论与实践方法的交织互动。马克思、恩格斯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出发,强调党报应相对独立于党组织,自主地贯彻、宣传党的精神。列宁将党性内涵从指导思想层面转移至组织意志层面,要求党报在组织和办报方向上予以遵守。中国共产党初期基本接受列宁对党性内涵的界定,并在灵活体现党的主张、以马列主义统合宣传内容等方面做出探索。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等人将报刊党性内涵发展为以我为主的立场和实事求是的哲学态度,强调报刊工作者的认识自觉和作风建设。整风运动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将党性内涵拓展至人民最高利益,并从党向党报学习、记者的党性两个角度,丰富对党性与真实性关系的认识。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运动前,以丰富的实践方法调适外来的报刊党性原则与本土命题之间的张力,继而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通过对党性原则的创新与重释,确立民族立场、实事求是、人民性的新闻原则地位。这既为毛泽东等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奠定基础,亦对我们构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报刊;党性;报刊党性原则;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4)05-0005-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BDJ055)

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原则,也是一个思想理论与实践方法在交织中不断演化的复杂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报刊党性原则的形成与确立过程,现有研究或侧重对党的相关文件、思想进行历时的梳理、比较,或聚焦关键事件考察党性原则的嬗变。前者如邓绍根和丁丽琼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的百年演化过程^[1];陈力丹发现:毛泽东对党性原则的创新在于,一是要求党报工作者“主动地积极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二是强调“地方党组织的报刊必须宣传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2]。后者如黄旦认为,经由《解放日报》改版,“党报是党的喉舌”由思想和原则“化成了具体的管理措施,党报——组织的喉舌由此紧紧扎根在了党组织身上”^[3]。这为本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报刊党性原则的理论与实践互动这一问题上,既往研究多关注从理论到实践的贯彻过程,并将《解放日报》改版视为党性原则从笼统理论到实践方法过渡的重要事件,而较少考察从实践到理论的反向变化,以及两者在交织中互动演进的复杂图景。事实上,报刊党性原则作为一个外来的思想原则,其从理论到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展开,是一个极具张力的历史过程,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密切。

要探讨这些问题,首先需厘清“报刊党性原则”这一概念。尽管“党性”一词被用于中国共产党报刊工作,始自延安时期,但邓绍根^[4]、周伟业^[5]等在考察中国共产党报刊党性原则时,均将其追溯至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揭示中国共产党报刊党性原则的源头所在。鉴于此,本文将报刊党性原则界定为关于报刊与党的意志之间关系的论述,并将之区分为思想理论和实践方法两个层面。在梳理中国共产党报刊党性原则的形成与确立过程中,本文将聚力考察其思想理论与实践方法的交织

互动,进而探讨此种交织互动与报刊党性原则中国化的关系。

一、马克思、恩格斯:党的报刊应独立自主地贯彻党的精神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立初期,马克思、恩格斯便有了党的报刊应遵循党的意志的思想。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强调,党报党刊的任务首先是论证、阐发、捍卫党的要求,批驳、推翻敌对党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论断,“德国民主派报刊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从以下各个方面证明民主制的必要性”^[6]。1849年,马克思和沙佩尔在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上,提议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负责监督联合会机关报从而使后者真正代表联合会的利益,“并根据我们党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7]。1860年,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再次使用“党的精神”一词,“在德国本土公开发表符合我们党的精神的政治性和论战性的东西,这是根本不可能的”^[8]。186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中,重申党报应遵循党的精神的观点:“《社会民主党人报》必须按照向他们宣布的那个简短纲领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9]

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的党的原则、精神,不同于党组织的意志。1890年,恩格斯在致《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信中,一方面赞扬《社会民主党人报》“极其明确和坚决地阐述并坚持了党的原则”,另一方面强调该报纸“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并举出报纸编辑部在航运津贴报道中反对党团意见、与党团开展斗争并最终获胜的例子。^[10]1891年,恩格斯致信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指出报刊的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科学,而非遵循党组织的意志,并认为两者不完全一致:“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侮辱,更不用说二者之间出现裂痕了。”^[11]这里的党的原则、社会主义科学,主要指科学社会主义,在概念、实际内容上均不同于党组织的意志。

在此认识下,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党报与党组织的独立关系。1873年,恩格斯以自己 and 马克思的共同名义致信倍倍尔,指出党的领导人尽管在形式上有权力监督机关报,但这种权力也可能“用来危害党”^[12],用意在于防止占据党内领导地位的拉萨尔派利用倍倍尔被监禁的机会掌控《人民国家报》。1891年,恩格斯致信倍倍尔,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管理刊物的计划表示“感到离奇”,并写道:“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新时代》以及其他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们也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11]1892年,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的信中再度提及此事。他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办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该刊物可以在不违反党的道德范围内自由地批评党的纲领和既定策略,以及在党的纲领和既定策略之下自由地反对党的某些措施。“这样,你们在道义上对这种刊物所起的影响,就会比对一半是违反你们意志创办的刊物要大。”^[13]此处“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在道义上”,在德语书信原文中分别为“einen bedeutenden moralischen Einfluß”^[14]“moralischen”^[14]。其中“moralischen”为形容词“moralisch”的变格,含义是“道德的”,在德语中偏重强调因内心认同而产生的教育意义。显然,恩格斯认同党报在总体思想上与党中央达成共识,但不主张党报严格遵循党组织的意志。

总体来看,马克思、恩格斯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指出党的报刊应符合党的原则、精神,其相对党组织的独立自主精神受到强调。用恩格斯的话说便是:“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容许讨论,但是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守共同的立场。”^[15]

二、列宁和整风运动前的中国共产党:党的报刊应遵循组织决议、体现组织意志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报刊党性原则的思想,并在俄国革命实践过程中,将报刊党性的内涵转移至组织意志层面。1904年,列宁就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多数派机关报的出版一事致信全党,指出办报的意义为“在同小组习气的斗争中捍卫党性”,“我们一定要把机关报办成俄国运动的机关报,而绝不是国外小组的机关报”。^[16]此处党性,强调的是报纸应代表全党而非某个小组团体的意

见。1905年,他在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主张“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认为如果不赶走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党将“不可避免地会瓦解”。他还将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之间的界限确定为党纲,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17]十月革命后,列宁在给Γ.米雅斯尼科夫的信中,指出“出版自由”这一口号是“不合乎党性的、反无产阶级的”。其依据是,“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18],因此实质是脱离党的领导而帮助资产阶级。这便将报刊遵循的对象,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具体化为党组织的决议、经验。

在确立报刊应遵循党组织意志这一思想后,列宁从多个层面论述报刊贯彻党组织意志的实践方法。在认识层面,写作者需意识到所从事的事业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组织层面,报纸应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必须参加到各党组织中去。^[17]在办报方向层面,报刊应适应变化中的党的中心工作的需要,如适应十月革命后的形势,“改变得符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要求”^[19]。自此,党报应经过思想和组织两个层面的改造,遵循组织决议、体现组织意志,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报刊党性原则的基本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基本继承列宁的报刊党性原则。一是明确报刊应遵循的对象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决议,明确任何出版物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20]1922年7月,党的二大决议加入共产国际,并完全承认共产国际的各项加入条件。^[20]这份由列宁草拟、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加入条件,不仅明确党的报刊须遵循共产国际决议这一根本原则,如“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必须符合第三国际的纲领和各项决议”,又如“各国党的一切指导性的机关报刊,必须刊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切正式的重要文件”;还具体地指出各国共产党必须遵循的统一宣传方针,如不仅要揭露赤裸的社会爱国主义,还要揭露社会和平主义的虚伪实质,要完全彻底地同改良主义、“中派”政策决裂并向党员群众进行宣传。^[21]

二是要求报刊从组织和办报方向两个层面贯彻党性原则。在组织层面,党的一大明确,一切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受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20]《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规定,各类党报党刊必须完全服从党中央领导,由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工作。^[21]这基本延续列宁关于报纸应受各级党组织领导的思路。

在办报方向上,除了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外,中国共产党还依据实际情况有所变通。党的一大召开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按照“办报以建党”的思路,创办、主办《新青年》《共产党》《广东群报》《湖南通俗报》等一批报刊。这些报刊骤办骤停,相当一部分由个人或小团体主办,如《广东群报》由陈公博任总编辑。基于各地报刊与党的松散关系,党的一大并未强制各地报刊主动宣传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而是以划出底线的方式,明确各地报刊不得刊载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20]

国民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宣传需要,对报刊党性原则的实践方法进行初步探索。

其一,强调党的主张背后的理论方向。经过建党初期对无产阶级革命与民主革命两大革命任务的纠结后,党的二大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此后,以《向导》周报为首的中共党报党刊,竖起国民革命的旗帜,呼吁包括工、农、学、商等各界在内的国民,起而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22]这种宣传收到不错效果,党中央发现民族革命运动受影响于我党宣传甚巨,“我们党的机关报《向导》竟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但由于理论基础不稳固而发生右倾问题,“过于推重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忘了自己阶级的宣传”。^[22]

鉴于此,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将端正党的理论方向作为宣传工作的主要目标,具体要求是“努力宣传民族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之关联和无产阶级在其中的

真实力量及其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决议案指出,党的宣传工作必须以健全的革命理论融通各部分,“使党员行动方有所准绳”。^[22]1925年2月,中共中央明确,宣传部的根本责任在于对内给予党员以马列主义教育,对外使党的思想切实深入群众,“对于党的一切出版物的内容,应随时加以监督和整理”。^[22]总体来看,聚焦组织意志的报刊党性原则,在实践中遇到报刊理论基础不稳固的问题,中共中央由是指明组织意志背后的马列主义理论,以此融通党的各项宣传工作。

其二,探索在白色恐怖下,报刊党性原则的不同实践方法。国民革命失败后,报刊党性原则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影响下,“彻底变更党的路线”^[23],提出以苏维埃革命为旗帜、依靠工农、反对帝国主义和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反动联盟”的彻底革命路线,并对宣传工作进行根本调整以适应宣传鼓动工农群众的需要。^[22]另一方面,国民党大肆查禁中共党报党刊,抓捕中共新闻舆论工作者。如何既宣传激进的革命路线,又保证报刊安全,成为一个两难问题。

在白色恐怖下,一些中共报人试图修改、掩饰党的主张,使报刊以较为温和的面目求得生存。对此,中共中央于1929年两次指出党报“代表我们党的意见”^[24],“一定要严正地代表党的意见,不能违背修改或掩盖一部分党的主张以迁就工作上的便利”,要求各级党组织“随时纠正同志因迁就客观环境降低或回避党的政治口号的错误”^[22]。相比建党初期针对小组办报的“不违背”原则,新的论述对报刊遵循党的主张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以使得党报能在白色恐怖下严正地代表党的意见。

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中共中央还对“灰色”报刊的办报方式进行探索。1928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部至少出版一种“灰色”刊物,并提出三点原则:①“灰色”刊物不登载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也不在评论文章中显露刊物与党组织的关联,而是使用“既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的第三方口气;②报道内容不必完全依据党的政策及口号;③注意传递工农兵革命即苏维埃革命是小资产阶级唯一出路的观点^[25]。这有助于补救严正宣传党的主张的党报风格之不足,但基本属于权宜之计的实践方法层面,即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灰色”报刊的使命仅在于使小资产阶级脱离国民党方面的影响,从而支持共产党或保持中立。^[25]

简而言之,列宁和共产国际将报刊党性的内涵,聚焦于组织意志层面。与之相应,党报党刊的作者须在实践中遵循组织决议、体现组织意志。中国共产党初期基本继承这一思想,并结合宣传需要,在灵活体现党的主张、以马列主义统合宣传内容等方面做出探索,但限于实践方法的层面,尚未上升至对报刊党性内涵和本质的重新阐释。

三、整风运动期间:强调立场和哲学的党性与凸显报刊工作者的认识自觉

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首次使用“党性”概念。^[26]整风运动伊始,毛泽东从个人服从全党、理论联系实际两个角度,提出立场和哲学上的党性观。此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化的报刊党性原则的探索,逐渐步入更加自觉的阶段。

(一)何为报刊党性:从组织意志到立场和哲学态度

其一,将报刊党性的内涵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之前,中国共产党关于报刊党性内涵的论述有两个特点:偏重组织意志层面和具有较强的国际性。后者具体体现在:将世界性与阶级性确立为党的理论方向,将遵循共产国际的纲领、决议界定为报刊党性的核心内涵,将遵循共产国际宣传方针、刊载共产国际文件视为报刊党性的体现。

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逐渐提出以党的立场为核心的报刊党性观。1942年2月,毛泽东首次在讨论报刊工作时使用“党性”一词:“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紧接着,他批评《解放日报》大量转载国内外通讯社新闻,较少报道党的政策与群众活动,或对相关报道不够重视,“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27]1942年3月11日,他在讨论《解放日报》改造草案时,再次强调:“(党性)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

益。”^[27]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以正式文件确认毛泽东的提法,将以登载国内外通讯社消息为主的办报方式定义为党性不强,批评此类报刊为他人“充当义务的宣传员”^[25],措辞相当严厉。1942年10月,毛泽东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将《解放日报》改版经验推广至各根据地,从而增强报人党性,“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28]。这样,立场层面的报刊党性内涵便基本明晰:坚持民族立场和阶级立场,反对报人向党组织闹独立性。这便将报刊党性的核心内涵,从共产国际的决议,转移至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其二,将哲学上的党性思想引入报刊党性原则。1942年3月,毛泽东在讨论党报工作时,首次提出“党性是一种科学”^[27]。此处科学,是指马列主义的科学品质:“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29]这一论述,不仅进一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报刊理论相结合,还提出新闻真实与党性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命题。

在《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著名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陆定一对党性与真实性的关系做出进一步阐释: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实事求是、科学的主义,故而“只有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无产阶级因为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故而能够“老老实实地理解事物”。^[30]1942年11月17日,《解放日报》刊载社论《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列出曲解事实、吹牛皮、乱批评、乱赞扬等党性不完全的表现,并将其根源归结于资产阶级报纸的影响和主观主义的作风。社论认为:“只有当我们党报的每一个环节都肃清了主观主义,我们的党报才能蒸蒸日上,具备完全的党性。”^[31]在这一阐释下,主张“新闻就是阶级性或政治性”是主观主义、党性不纯的表现,坚持“事实第一性”是唯物主义、党性的体现。这便确立了真实性原则作为报刊党性原则组成部分的重要位置。

(二)如何贯彻党性:强调报刊工作者的认识自觉和作风建设

随着对报刊党性内涵的重释,报刊党性的体现,由遵循、宣传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政策、决议,转变为牢牢站在党的立场和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报刊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和作风建设问题由此凸显。在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和解放日报社一是要求记者、编辑在思想上要自省,主动把个人融化在党集体之中,使个人的利益、兴趣“服从于这个大的集体的利益”,^[31]遇到新闻先想想是否对党有利,从而做到在一言一动、一字一句中顾及对党的影响;二是要求报刊工作者在观点上要沟通,不但要在总体思想和办报思路上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主动沟通,做到“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32];三是要求报人在作风上要转变,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力戒主观主义作风,“建立新闻事业对社会对人类完全诚实完全负责的风气,对党对人民完全诚实完全负责的风气”^[33]。在《解放日报》改版期间,中国共产党还对党报的组织形式开展改造,通过“全党办报”将党性原则转化为具体的管理措施,实现党报与上级党委意志的息息相通。

报刊工作者的认识自觉,最终需落实到报刊对党的意志的严格贯彻。1942年9月5日,陆定一在解放日报社编委会上传达中央指示:“报纸仍未和中央息息相关,虽然总的路线是对的……以后凡有重要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论,均须与中央商量。”^[34]报社社长博古亦多次重申类似要求,强调记者、编辑应牢记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条题目、每一则消息“都对全党负了责任”^[32]，“按党的立场,党的观点去分析问题,每一则新闻评论、编排都围绕着它”^[35]。这使得报刊对党性原则的贯彻,从办报方向上的不违背、不修改、不掩饰,发展至报刊内容的严格遵循,其目标是“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36]。

至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报刊党性原则基本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报刊党性的内涵,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政策、决议这一组织意志的体现,转向代表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党的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哲学态度。报刊党性原则的实践方法,随之由组织规范层面拓展至认识自觉层面,实现从思想到行动、从方向到细节的全面覆盖。

四、整风运动之后：在总结实践经验过程中发展报刊党性原则

整风运动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总结办报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丰富报刊党性原则。

（一）总结国统区办报经验与“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论述的提出

《解放日报》改版工作展开后，毛泽东便开始考虑大后方报刊如何贯彻党性原则的问题。1942年3月14日，毛泽东致电远在重庆的周恩来，介绍延安关于使《解放日报》增强党性、反映群众的讨论，建议《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28]9月18日，《新华日报》发表改版社论《为本报革新敬告读者》，对党性的阐释是：“它应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和群众生活，使它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要使报纸从各方面贯彻党的政策。”^[37]这基本延续中国共产党初期从办报方向上规范党性实践方法的做法，与毛泽东在整风时期强调的报刊应严格、主动贯彻党的意志有所不同。其缘由在于，《新华日报》身处险恶环境之中，一方面要避免因党报色彩过浓而引致国民党干涉，另一方面需贴近民众以与其他报刊竞争。1943年9月，《新华日报》的办报风格受到部分党的领导人的批评：“（《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38]经中共中央讨论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3年11月，就《新华日报》贯彻党性原则提出两点要求：“既是党报，则环境若何困难，总不要违背党的方针”；“在大后方思想斗争的中心任务不是党的自我批评，而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反动派”。^[25]这在事实上认可了《新华日报》从办报方向上贯彻党性的做法，同时为大后方报刊划出“不违背党的方针”的底线。

从1945年秋到1947年初，胡乔木、熊复等人在总结《新华日报》贯彻党性原则实践基础上，提出“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观点。相关论述首先是在理论层面，从中国共产党报纸完全站在人民立场、办报从人民利益出发、宣传内容为人民所需要三点出发，提出报纸最高的党性在于“能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斗争”。^[39]这便为报刊党性增添了“反映人民”这一新内涵，并为解放区媒体所接受。1948年11月，在新华社中原总分社对党性内涵的定义中，其中之一便是“代表人民的最高利益”^[40]。

“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论述，还在实践方法层面，为报刊党性原则增添“符合群众兴趣，为人民服务”这一新维度。此前的报刊党性原则，以党的立场、观点和哲学态度为核心旨归，身处国统区的《新华日报》，尽管在实践中有所变通，仍遵循增强党性的大致方向。对此，有读者反映报纸措辞过于激烈、党报色彩太浓厚，建议将宣传和新闻分开。在此形势下，《新华日报》总编辑熊复将“党报色彩太浓厚”阐释为党性不够即人民性不够的共同表现，“简单说来，就是为人民服务还做得不够”。沿着“多方面做到为人民服务”这一思路，他将改造方针确定为突破反映政治生活和全局需要的局限，在报纸形式和内容上努力做到反映人民多方面生活、适应人民多方面需要。^[41]这便将理论层面上的“党性与人民性相一致”引申至实践方法层面，从而做到报刊在不同环境下贯彻党性原则的实践方法与党性原则理论的融通。

（二）反“客里空”运动与报刊党性原则的发展

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陆定一通过将哲学上的党性引入新闻工作，确立真实性原则的重要地位。在“增强党性”与“事实第一”两大原则确立后，如何保证报道既紧跟党的政策，又避免以偏概全，成为新闻实践中的新矛盾，并在反“客里空”运动中集中爆发。

“客里空”原本为苏联剧本《前线》中一名记者的音译。1947年6月15日，《晋绥日报》刊载《前线》剧本中关于“客里空”的章节，强调“客里空”的工作作风为捕风捉影、凭空虚构、不忠实于人民。^[42]1947年6月25日、26日，《晋绥日报》连载编辑部文章，集中暴露报纸存在的“客里空”问题，主要有：编辑工作粗枝大叶，记者有意美化地主、恶棍，记者、通讯员稿件不真实，报社从不同渠道收到的稿件内容相互矛盾^[43]，记者采访不扎实、对采访对象的认识不够深刻^[44]。这本身便包含作风不实与立场不稳两种问题。1947年8月28日至9月1日，新华社总社连发三篇评论，将“客里空”作风上

升至记者的党性问题,指出“客里空”的思想根源在于有些同志专心于名誉、地位、权力、待遇、兴趣等“个人成就”的打算,因而不能脚踏实地地为人民群众工作^[40],“在土地问题上……有些个别人员则表现出立场上的堕落,而不正派的作风就发生出来,主要的表现于袒护地主、打击农民、窃取果实、欺骗上级”^[40]。1948年1月,周扬重新强调“客里空”与党性的关系,将这种不顾群众实际情况、依据上级领导需要开展报道的工作作风,上升至小资产阶级的投机性、迎合性作风问题,并批评“这是一种毫无党性、毫无阶级立场因而也没有人民立场的人”^[35]。这种将右倾报道与新闻不实、缺乏党性画等号的做法,有助于矫正土改报道中的右倾问题,但显然有些武断,甚至被批评为“以客里空反对客里空”^[40]。此后,土改报道一度出现“左”的偏向,在一定程度上与记者顺应反“客里空”的风向有关。

在反思“客里空”问题的过程中,记者的党性修养问题受到重视。延安时期,博古便曾论及党报记者的品质问题,但将之分为作为党员的品质和作为优秀记者的品质两项论述,并未做出理论上的开拓。^[35]在总结土改报道经验的基础上,彭真将个性服从党性的党员标准和实事求是的报刊党性原则相结合,提出“布尔什维克记者”概念,其要义有三:一是记者的任务在于透过复杂事物抓住本质,给人们指出前进方向;二是记者应精通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指示政策,“要求一般党员自然不能这样严,但记者编辑总编辑就一定要精通,不然工作就搞不好”;三是记者应从党的立场出发,站在全局高度看待局部问题,“要找比较大量的,普遍的,能代表的一般的问题”。^[35]针对记者盲从指示、报道非“左”即右的现象,胡乔木提出:共产党的记者和统治阶级的记者不同,差异在于坚持真理,要“按照实际事物去报道,按照实际去追求真理”,这种真理是为了行动的,“必须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35]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则反复教育记者深入连队、深入基层,其用意被记者理解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坚持党性原则,保证新闻真实”^[45]。这反映党和报社的领导人希望:记者能在精通政策的前提下,将对事实的认识上升至理性层面,从而实现新闻报道党性与真实性的辩证统一。

刘少奇从党向党报学习的维度,进一步拓展报刊党性的内涵。此前,关于报刊贯彻党性原则的论述,强调的是报刊应在何种程度上、采取何种方式贯彻党的意志、宣传党的主张。刘少奇则从下情上达的角度出发,指出党的政策不是完全正确的,并将党与群众联系的主要办法界定为党依靠记者指导党政军工作和人民活动、党依靠记者了解人民实际情况两种。在此基础上,刘少奇提出以如实反映群众为核心的报刊工作原则:态度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任务是发现人民运动中的各种情况,工作第一要真实,第二要全面、深刻,“提到政策、理论的高度”,第三要了解党的总路线和政策,“经常研究,天天看,加以考虑,时刻注意党的政策变化了没有”。对于党的政策,记者不仅需要宣传,还需深入实际、创造性地考察政策是否正确。^[35]这些论述进一步强调记者的独立见解和实事求是态度,有助于指导新闻工作者走出反“客里空”运动以来“正确立场=合理选择事实=真实报道”的简单逻辑,真正站在党的立场、发挥主动性,在事实中考察党的政策,全面地、深刻地进行公开报道或向上反映。

总体来看,整风运动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总结国统区办报经验,从“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角度发展报刊党性原则;另一方面针对“客里空”问题,从党向党报学习、记者的党性两个角度丰富了对党性与真实性关系的认识。

五、从实践到理论:报刊党性原则中国化的路径

综上所述,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立初期,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报刊党性原则中,长期存在思想理论与实践方法的交织关系。一方面,党性原则理论的几度嬗变,对报刊贯彻党性原则的实践方法影响深远。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办报实践经验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党性原则理论。如果将这一过程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阈,可以发现: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基、列宁集中阐发的报刊党性原则,在被中国共产党引入并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与民族立场、传统认知和中

国革命环境发生牵连。其间,中国共产党逐渐将部分实践方法提升至思想理论层面,成功调适外来思想理论与本土命题之间的张力,实现报刊党性原则的中国化。这集中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宣传民族话语,发展至“以我为主”的办报理念

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报刊党性原则,具有较强的国际性,这体现于三点:将遵循共产国际的纲领、决议视为报刊党性的核心内涵;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确立为各国共产党报刊的理论方向;将各国共产党视为共产国际的支部。这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初期的报刊实践,但存在宣传内容超前于中国实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一原则内蕴的宣传立场,受到众多首要强调民族立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抵制。

对此,中国共产党在整风运动前,主要采取变通宣传话语的实践方式,并呈现非“左”即右的特征。建党初期和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鉴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过于超前,构建以全民族话语为基础的国民革命话语,以广泛动员国内各界,但“过于推重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忘了自己阶级的宣传”,以致偏离“世界性与阶级性”这一党的理论方向。^[22]党的六大后,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形成以阶级话语为基础的苏维埃革命话语,以团结广大工农建立、保卫苏维埃政权,但“没能够在斗争中,揭破国民党以及各反革命派别出卖民族利益的事实”,没能清楚地宣传革命以争取民族统一和独立解放,“甚至怕谈民族两字,怕落进国民党民族主义的圈套中去”。^[46]全面抗战爆发后,党的宣传话语重新恢复以全民族话语为基础,形成团结全国抗日人民、联合抗日力量、批判妥协投降行径、以争取抗战胜利为主旨的话语体系。但是,这一话语一方面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阶级立场,“说来说去(国共)两个主张好像都是一样”^[47];另一方面受到党外人士对其属于一时宣传策略抑或根本立场的质疑。总体来看,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由于“党的理论基础常常动摇不定”,报刊宣传常出现“左”或右的偏向。^[22]

在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将报刊坚持民族立场的实践经验,上升至思想理论层面。他将以报道中国事务为中心界定为报刊党性的体现,并将这一标准具体化为报纸是否注重宣传中国抗战、中国共产党活动和抗日根据地建设。^[48]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解放日报》放弃“以外为主”的版面结构和话语体系,致力宣传从中国国情出发,既强调民族革命,又凸显民主革命,并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胡乔木认为,“《解放日报》改版,根本的关键,是‘宣传上要以我为主’。”^[49]这里的“我”即党,“以我为主”即以中国共产党为主。经由改版,报刊遵循的最高原则,从共产国际的纲领、决议,转向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得以在报刊上严格贯彻。

(二)从注重运用事实开展宣传,到提出实事求是的新闻理念

共产国际和延安时期之前的中共中央在谈及报刊工作时,并未使用“真实性”一词,而是较多使用“事实”“新闻”等词。他们关于党性与事实关系的论述,强调的是报刊应善于运用事实开展宣传。《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一条便规定:“无产阶级专政不应只当做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而应很好地加以宣传,使每一个普通的工人、士兵、农民都能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不断报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21]党的六大后,中国共产党大力兴办新闻类报刊,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指出,日报一定要“从叙述新闻中宣传党的主张,这样才可以使日报更加适合于群众的需要与兴趣……在不能办日报的地方,亦应当尽可能地办新闻式的定期刊物……因为这与日报差不多有同样的作用。”^[22]1930年8月,第一份以新闻为主体、逐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创办,在发刊词中将登载事实的意义阐释为传达各地革命活动、发布党对革命中各个问题的主张,并提出关于报纸功能的经典论断:“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50]1932年底,中共中央宣传系统负责人张闻天系统检讨宣传工作,要求通过带有时间性、具体性的事实,对党的主张开展“忍耐的解释与具体的证明的工作”^[51]。从这些论述看,为党宣传是党报的原则,“运用事实开展宣传”则是报刊党性原则的一种实践方法。

这种对事实的工具性理解,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秉笔直书”理念之间,存在张力。自春秋《左

传》称赞齐国太史“秉笔直书”，到晚清《申报》倡导“有闻必录”，“秉笔直书”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价值追求，逐渐从史官拓展至报人群体。这一思想亦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大钊在1922年提出：“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是过去旧的社会状况的写真。现在的新闻纸，就是将来的历史。”^[52]这段话不仅以“写真”一词突出对新闻真实的追求，还将历史的真实与新闻的真实勾连起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宣传工作中存在失实现象，宣传员一度被称为“卖假膏药的”。针对此，毛泽东明确反对“靠扯谎吃饭”和离事实太远的办报方式^[28]，强调“‘卖假膏药’等等奇怪的称呼，应该从此取消掉”^[28]。尽管这些论述在当时并未成为党的宣传系统的主要指导原则，但显示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事实的另一种理解。

从报社实践层面看，由于对事实的工具性认识、紧张的革命形势，以及采访通讯体系的不健全，一些报刊形成粗放的办报作风。如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1941年5月创刊后，登载了一些记者道听途说、凭主观写作的稿件，因内容失实而闹出笑话。^[47]1941年底，解放日报社总结发现，报纸稿件“欠真实”，要求通讯员如实“反映群众的意见，真诚地报道事实”。^[53]失实报道不仅有损党报和党的威信，还影响各级党组织掌握实际情况。延安时期，为战胜根据地困难，中共中央制定、实施包括精兵简政、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在内的十大政策，亟须了解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情况，以做调整。《解放日报》的创办目的之一，便是反映地方和末端组织的实际情况。^[54]而报道一旦片面、浮夸或失实，便可能影响党对群众和政策实际情况的了解，“据此指导工作，势必招致错误”，长此以往有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25]

在纠正报刊粗放作风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将“秉笔直书”的传统认知与马列主义相结合。一方面，毛泽东、陆定一、胡乔木等人从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品质出发，强调记者应尊重事实，“所谓唯物论，就是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我们要求记者，也应该是这样子的”^[35]。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秉笔直书”的传统理念加以演化。其中堪称典型的是，《新华日报》于1943年9月1日刊发《记者节谈记者作风》，提出：“我们要为中国记者从自己历史中找寻优良的传统”；“说古时的史官和今日的新闻记者，在精神上自也有其一脉相承之处，并不为过。”该文以春秋史官董狐作为坚持真理的榜样，呼吁记者扪心自问：“曾否对董狐那枝直笔放松过乃至放弃过？是否对得起真理，对得起人民？”^[35]两者结合的成果，便是“实事求是”新闻原则的提出：一方面要求记者深入调查，全面地了解事实；另一方面指导记者将对具体事实的认识上升至反映全局、指导实践的理性层面，从而由“秉笔直书”发展为“坚持真理”。这便实现“秉笔直书”传统与报刊党性原则的协调，进而为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提供文化渊源。

（三）从不同环境下办报的实践方法，到“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尽管自成立起，便继承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报刊党性原则的思想，从组织和办报方向上对党报予以规范，但在复杂的革命形势下，这一原则很难得到整齐划一的执行。对此，党在相当长时期内，偏重从实践需要的层面进行考虑。例如：鉴于建党初期各地报刊与党的松散关系，党的一大以划出底线的方式，明确各地报刊不得刊载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对于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共合办报刊，陈独秀多次根据国共合作需要调整办报方向，以致党内部分同志认为这些报刊未能遵循党的精神。^[55]对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灰色”报刊，党中央在提出使用第三方口吻、暗示苏维埃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的出路等办报要求后，强调“灰色”报刊的使命仅在于使小资产阶级脱离国民党方面的影响，从而支持共产党或保持中立。总体来看，这些都属于具体实践方法的层面，并未上升至对报刊党性内涵的重新思考。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报人开始考虑如何将《解放日报》增强党性的实践方法，应用至以《新华日报》为首的国统区报刊上，但遇到两难困境：一侧是以根据地报刊的党性标准来看，《新华日报》显然党性太弱；另一侧是国统区的政治形势和阅读环境，使得《新华日报》增强党性的尝试屡屡受挫。在此情况下，胡乔木、熊复提出“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论述，既在理论层面，确立“反映人民利益”作

为党性内涵的重要地位;又在实践方法层面,将“符合群众兴趣,为人民服务”阐释为党性原则的体现。这不仅丰富中国共产党关于在不同环境下贯彻报刊党性原则的认识,更在改革开放后,成为新闻界革新延安模式、拓展新闻理论的重要理论起点。

总而言之,在移植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报刊党性原则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以丰富的实践方法,调适外来思想原则与民族立场、传统认知、中国革命环境等本土命题之间的张力,继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下,将具体实践方法上升为思想理论,通过对党性原则的创新与重释,确立民族立场、实事求是、人民性的新闻原则地位,展现非同一般的智慧。

这种从实践方法到思想理论的升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报刊党性原则中国化的关键一步。经此转变,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取代共产国际决议成为报刊遵循的首要对象。党性原则与秉笔直书传统的结合,一方面破除了报人对共产国际指示和宣传教条的迷信,另一方面为中国共产党深入了解实际进而寻求真理和指导工作提供支撑。这便使报刊党性原则由一个偏阶级性和国际性的宣传教条,转变为富有人民性和实践性的立场和方法,进而为毛泽东等人构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奠定基础。

从更长的历史维度看,报刊党性原则中国化还是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一次成功尝试。中国共产党对报刊党性原则的改造,一方面以理论与实践互动的方式,实现宏观原则与贯彻方法的融通,另一方面通过对“党性”这个核心概念的重释,为实事求是、人民性等概念提供理论阐释空间。这对我们当下赓续构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 [1] 邓绍根,丁丽琼.百年铸魂: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的发展历程.编辑之友,2021,6:67-78.
- [2] 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55-558.
- [3] 黄旦.从“不完全党报”到“完全党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再审视//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277.
- [4] 邓绍根.百年寻根: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原则的确立.中国出版,2021,9:5-12.
- [5] 周伟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性原则与创新精神关系的历史考察.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4:100-104.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80.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六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687.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5.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二十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16.
-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83-284.
-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2;612.
-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90.
-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八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7-518.
- [14] K. Marx, F. Engels.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38. Dietz Verlag Berlin, 1979:94;517.
-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二十九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697.
- [16] 列宁.列宁全集(第二版):第九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84-86.
- [17] 列宁.列宁选集(第三版):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5;663-664.
- [18] 列宁.列宁选集(第三版):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46-549.
- [19] 列宁.列宁选集(第三版):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71.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141;4-5;5.
- [21] 戴隆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646-650;646;646.
- [22]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650;618;619;627;822;891-892;618-619;618;891.
- [23]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八):第四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06.
- [24] 中央党报的作用及同志对党报的义务.党的生活,1929,4:24.
-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39;39;126;137;153.
- [26]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十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96.
-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62;367;367.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140;111;30;13.
- [2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0.
- [30] 陆定一.陆定一新闻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6.
- [31] 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解放日报,1942-11-17(1-2).
- [32] 吴葆朴,李志英,朱昱鹏.博古文选·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313;313.
- [33] 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解放日报,1945-3-23(1).
- [34] 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延安《解放日报史》大纲(征求意见稿).新闻研究资料,1983,1:5-47.
-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203;286;204-205;264-269;275;252-262;275;59-60.
-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54.
- [37] 为本报革新敬告读者.新华日报,1942-09-18(3).
- [3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资料:第七十一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159.
- [39] 《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6.
- [40]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中国报刊广播文集(三).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内部用书,1980:213;194-195;199;206.
- [41] 本报编辑部.检讨和勉励——读者意见总结.新华日报,1947-01-11(5).
- [42] “客里空”.晋绥日报,1947-06-15(4).
- [43] 本报编辑部.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晋绥日报,1947-06-25(4).
- [44] 本报编辑部.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晋绥日报,1947-06-26(4).
- [45] 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人民新闻家邓拓.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57.
- [46]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一):第七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32.
- [47] 陆定一.陆定一同志谈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在解放日报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新闻研究资料,1981,3:1-8.
- [4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二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419.
- [49]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5.
- [50] 向忠发.发刊词我们的任务.红旗日报,1930-08-15(2).
- [51] 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张闻天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317.
- [52]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0.
- [53] 解放日报采访通讯科.给本报通讯员的一封信.解放日报,1941-12-25(4).
- [54] 藤田正典.中国共产党新闻雜誌研究.東京:アジア經濟研究所,1976:41.

[55] 茅盾. 我走过的道路(第二版):上.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367-368.

The Evolution of the CPC News Enterprise's Party Character Principle(1921—1949)

Du He(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In the principle of party character in Marxist parties' news enterprise, there has long been an interweaving intera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al methods.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ing scientific socialism, Marx and Engels emphasized that party newspapers should independently carry out and promote the spirit of the party. Lenin shifted the connotation of party character from guiding ideology to organizational will, demanding that newspapers comply with the organizational and editorial directions. The CPC essentially accepted Lenin's definition of party character and explored flexible approaches in embodying the party's principles and strengthening theoretical propaganda. During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Chinese Communists led by Mao Zedong transformed the main connotation of party character into the party's stance and the philosophical attitud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emphasizing journalists' conscious understanding. After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the CPC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 in implementing the party character principle, expanding its interpretation to the highest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enrich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y character and truthfulness. Overall, the party character principle expounded by Marx, Engels and Lenin, when introduced and put into practice by the CPC, became intertwined with the local propositions such as nationalism and truthfulness, as well as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environment.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CPC elevated certain practical methods to the level of ideological principles, achieving the Sinicization of the party character principle. This not only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Mao Zedong and others to establish a proletarian news theory in China, but also provided inspiring implications for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Chinese journalism studies.

Key words: CPC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party character; party character principle of newspapers; Marxist journalism theory

■收稿日期:2022-04-13

■作者单位:杜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精神文明研究所;广东广州 510635

■责任编辑:肖劲草